

湖南师范大学
文史研究所编

林彪山论史萃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纪 念

湖南师范大学建校五十周年

麓山論史萃編

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十月

麓山论史萃编

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编

责任编辑：天容 邓代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25 插页：2

字数：354000 印数：1—1500

ISBN7—217—00495—0

K·47 定价：5.40元

目 录

近代湖湘文化试探.....	林增平 (1)
知识分子与中国历史发展.....	林增平 (23)
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结构及其特征.....	饶怀民 (38)
中西封建社会主体文化兴衰的反思.....	熊家利 (56)
中国和欧洲的直接交往始于何时.....	莫任南 (70)
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	林增平 (77)
论孙中山的自然观.....	韦杰廷 (99)
孙中山社会历史观研究述评.....	韦杰廷 (132)
关于新民生主义的比较研究.....	邓新华 (146)
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	林增平 (159)
预备立宪与清末政潮.....	迟云飞 (180)
同盟会“非团体联合”史实考.....	郭汉民 (193)
共进会平议.....	周秋光 (205)
进步党述论.....	李育民 (228)
大革命研究述评.....	范忠程 谭属春 (254)
论康梁异同.....	郭汉民 (266)
重评胡适.....	欧阳哲生 (311)
试论《民报》时期汪精卫的民族主义思想.....	饶怀民 (326)

试论佛学心学及浙东学派对谭嗣同的影响	黄艺农(355)
评冯友兰的“新形上学”	陈先初(362)
论恩格斯的人类起源动力思想	鲁小兵(386)
论召公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游唤民(398)
康居古国初探	莫任南(405)
匈奴的军事制度	莫任南(421)
十九世纪沙俄朝阿富汗方向的推进	王治来(440)
古罗马兴衰时期的社会道德	李长林(450)
论希腊民族特性对古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	兰奇光(460)
试说《史记》的本纪义例并及史公立项纪的求实意义	
.....	谭绪绩(471)

后 记 编 者(484)

近代湖湘文化试探

林增平

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漫长的古代，在湖南没有出现过几桩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大事，属于湖南籍的名人，寥若晨星。而跨入近代（1840年后），就迥然不同，在诸如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重大事变中，湖南所产生的反映，着实引人瞩目，且人才辈出，为人们所称道，延续至现代，更呈现出鼎盛的局势。其故安在？这是近年学术界所乐于议论，亦即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

晚清维新派人士、经学家皮锡瑞说过：“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至元欧阳原功、明刘三吾、刘大夏、李东阳、杨嗣宗诸人，骎骎始盛。”^①事实上，即使到了明代，与邻省比，仍然瞠乎其后。检索一部近年编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②可以窥其大概。该书共收入历代名人3755人，鸦片战前为3005人，其中湖南籍者仅23人，只占同期全国名人的0.77%。就以皮锡瑞所谓“骎骎始盛”的明代来说，在上述《辞典》中，明代共收名人496人，其中湖南籍者6人，占1.2%，而江西省籍的

① 《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05页。按：刘蜕号为“破天荒”，出自光绪十八年刊《湖南全省掌故备考》卷二八《人物》。

② 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版。

则有38人，占总数的7.8%。两相比较，仍相形见绌。还是辛亥革命志士杨毓麟说得确切：“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凡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①事实也确如此。上述《辞典》的近代部分共收录名人750人，其中湘籍的85人，占同期名人总数的11.33%。证之日本学者因田一龟所考察的情况，也大体近似。这位学者依据他收录的自汉代至明代5690个名人的籍贯列表比较，河南独占鳌头，计912人，占总数的16%；湖南只55人，仅占0.96%。就元明之际看，收录名入共1679人，江西跃居第三，计204人，占同期总数的12.2%；湖南仅27人，占1.7%。进入现代，收录人物677人，湖南籍者42人，占同期总数的6.4%，明显地超过江西（28人）^②。难怪乎著名史学家谭其骧称：“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③时至今日，侨居美国的华人主编的《北美日报》（纽约），在1986年7月1日的《社论》里还提到：“湘籍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近百年一直居各省之冠。”

近代湖南人才之盛，始于太平天国时期，即起自曾国藩等筹组湘军。还在太平天国败亡的前一年（1863年），一个官员在日记中就写道：“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松（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曾涤生胞兄弟两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余年中所未见。天下事不可太盛，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生克，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

① 〔日〕因田一龟著，黄惠泉、刁英华译：《新中国分省人物志》，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0年版，第8—14页。

② 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史学年报》第1卷第4期。

③ 湖南之湖南人：《新湖南》第2篇。

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家乎？一门鼎盛，何德以堪？自古至今，未有数传而不绝灭者。吾为楚人惧，吾盖为曾氏惧也！”^①这个大段感叹，无非是觉得湖南省和曾氏一门的旺气盛况，已经到达极限，逾乎常情。1881年（光绪七年）王闿运撰《湘军志》脱稿，虽对湘军有所讪刺，但也很得意地宣称：“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②据统计，湘军要员官至督抚者达二十七人（总督十四人，巡抚十三人）^③。

诚然，太平天国起义，是正义的、进步的运动；而湘军，则属不义的、反动的政治、军事集团，理应给以谴责。然而，历史本身又是曲折的，经常产生反复的一个演变过程，往往会出现正义的、进步的势力因自身的错误或领导集团的腐化而遭到挫败；而不义的、反动的势力则获得阶段性胜利的现象。但是，这样的胜利者却决不能把历史拉着向后退却，而是必然受历史前进规律的约束，不自觉地去谋求达到失败者所曾追求的目标。如同恩格斯说的：“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④又称：“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⑤不是吗！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提出了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义的《资政新篇》，显露了这次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将要把中国社会导向的前途。恰恰在同时，镇

①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版，第377页。

② 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

③ 罗尔纲：《湘军新志》，第96页。

④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0页。

⑤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9页。

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李鸿章就开始筹办洋务；迄太平天国覆败后，洋务新政就加速地进行起来。正是这样，湖南的有志之士就获得湘军将帅的援引，成长为各个方面的人才，从而使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期间，湖南似乎成了举足轻重的省份。

维新运动兴起后，湖南即颇有点得风气之先的气概，举凡开学会（南学会等），兴学校（时务学堂），办报纸（《湘报》、《湘学新报》）等维新新政，都率先兴办，卓有成效。著名的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且以左翼首领见称于时，故时人将湖南称为“全国最富朝气之一省”，并非虚言。

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首倡者是孙中山及其所创立的兴中会，而继起响应者，当首推黄兴和他所组织的华兴会。1905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领衔组成同盟会，据考订，参加7月30日筹备会的共79人，居首位的是湖南籍志士，计20人，次为湖北，19人，再次为广东，16人，以下为广西、安徽等省籍人士^①。又据1905—1907年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的名册统计，湖南籍者为157人；次为四川，127人；再次为广东，112人；湖北106人^②。正由于有如此众多的湖南志士加入了同盟会，因而在辛亥革命期间的重大斗争场合，几乎都有湖南志士的业绩和勋劳，并产生了饮誉遐迩的一代英豪如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刘道一、禹之谟、蒋翊武、谭人凤、姚宏业、杨毓麟、焦达峰、陈作新等。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革命的丰碑上。

湖南近代发生的对全国影响巨大的事件前后踵接，自然要产生众多的比肩鹊起的著名人物；而叱咤风云，驰骋宇内的名人一多，自然要使湖南成为海内举足轻重的省分。湘军兴起不久，清统治者很快就倚作长城。如同侍读学士潘祖荫在推崇左宗棠的奏

① 郭汉民：《同盟会“非团体联合”史实考》，《湖北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

折里写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①就湖南而论，既非形胜要害之地，也非财赋充盈之区。王闿运曾指出：“湖南自郡县以来，曾未尝先天下。……至其财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②显然，所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实际上是指不可一日无湘军。维新运动期间，皮锡瑞称：“近日湖南风气又为各省之最，是由地气变得益盛，亦由乡先贤之善变也”^③。唐才常转述西方各国和日本的言论称：“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④故谭嗣同在诗里颇为自信地吟哦道：“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⑤倾吐了湖南志士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豪气。梁启超入湘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即深有感触地写道：“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摩萨、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近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⑥杨度早年写过一首长篇的《湖南少年歌》，很自豪地吟咏道：“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⑦这一切都反映了湖南志士对振兴祖国的责任感和自信心。

近代湖南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盛况，延续至现代，更呈上

① 潘祖荫：《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材可用疏》，《潘文勤公奏疏》第25—26页。

② 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

③ 《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05页。

④ 《论兴亚义会》，《唐才常集》，湖南哲学社会科学院编，中华书局版，第178页。

⑤ 《论艺绝句》六篇之二，《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版，第460页。

⑥ 《南学会叙》，《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66页。

⑦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95页。

升之势。别的不说，只就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人来看，其勋名远播，功业非凡者，湖南籍的应属数一数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领导人中，湖南籍的有10人，占19.2%。1955年，给长期戎马倥偬，功勋卓著的军事领导人授勋典，在授予元帅的10人里，湖南籍的3人，授大将的10人里，湖南籍的6人，授上将的57人里，湖南籍的19人。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八个字可谓历久常新。

三

湖南从古代“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到近代一跃而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省分，原因何在呢？

先秦时代，中原已进入封建制社会，而湖南大部分地区还处于榛狉草莽的阶段。汉以后，始渐次开发。至三国，“衣冠礼乐，浸假而自比于中国”^①。然而，社会生产和文物教化仍远逊于中原地区。故迟至唐大中四年（850年）刘蜕中进士，号称“破天荒”。至宋代，文化发达的江西省陆续向湖南移民，湖南的经济和文教事业开始有较大进展，长沙岳麓书院名重一时，跻身天下四大书院之列。然而，嗣经元末明初的纷扰，湖南人口锐减，几至十室九空，经济顿形衰败。于是，明代洪武年间起，邻省即大量向湖南移民；借移民的力作，生产得以恢复发展，随之而出现皮锡瑞所谓“殷殷始盛”的局面。嗣又经明末的纷攘，清军入关，“三藩”酿祸，湖南重又陷入荆榛塞路，旷野无人的境地。故自清初起，又一次产生邻省向湖南的大移民。

在古代史上，湖南开发较晚，又长期被人们称作瘴疠卑湿之地，故文教远逊中原和东南地区，不能不令人产生“湖南人物，罕见史传”的浩叹。经历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度大移民，湖南

① 《后汉书》卷八六，《郡国志》。

居民实行了历史性的全面更新。从而导致湖南人口的新组合，形成了与清代前居民不同素质，不同性格的新居民。近代湖南赢得“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声誉，就主要是清初起进入湖南的移民，经数代的繁衍生息致使湖南的经济和文教获得发展的结果；而氤氲绵延，潜滋暗长地导致这个结果的精神支柱，则是在清初起移入境内的新居民中逐渐形成的习俗和风尚。

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元统治者派兵四出镇压，致兵燹遍于各省；嗣起义各派势力又迭起内讧，战乱相寻，湖南也被殃及，大批民众流窜死亡。据《醴陵县志》载：“历朝兵燹，元为最惨。……元明之际，土著存者仅十八户”，“聚居山上，……如是者近三十年。及闻大乱已平，始相率下山。”^①该书又引“同治《志》载汪辉祖淑厚《脱难录》，谓历朝鼎革，荼毒生灵，惟元明之际为惨，湘潭土著仅有数户。后之人多从豫章来。”^②明朝建立，实行招诱流亡和移民垦殖政策，相邻省分即络绎向湖南移民就食。据明代记载称：“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方，所出不足以供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③谭其骧曾依据《道光宝庆府志》、《光绪邵阳县乡土志》、《光绪武冈州乡土志》、《光绪湘阴县图志》、《光绪靖州乡土志》等五志的《氏族志》，对宋朝起迁入宝庆府和靖州、湘阴的氏族加以统计，情况如下^④：

土著	9族
外来移民知原籍	517族
外来移民不知原籍	63族
不明	115族

① 《醴陵县志》《氏族志》，1948年刊。

② 《醴陵县志》《政治志·户籍》，1948年刊。

③ 丘浚：《江右民迁荆湖议》，《明经世文编》卷七二。

④ 谭其骧：《湖南人山来考》，第一表，《方志月刊》第6卷，第9期。

移民由江西迁入者达324族^①，占63.1%。按迁入时代计：明代迁入者计268族，其中约有七成是明洪武、永乐年间迁入的（181族）^②。魏源及其同族、曾任清两江总督魏光焘的先世就是明初由江西吉安迁到邵阳县金坛（今属隆回县）的^③。醴陵县与江西毗邻，江西迁入者更多，计达296族，大部分是明初洪武年间迁来的（200多族）^④。到明万历六年（1578年），湖南人口约190万。主要因移民的开发和生聚教化，明代后期，湖南的社会经济获得发展，文化事业也有相应的进步。然而，明末清初又一次的“鼎革”，湖南居民又一度陷入死亡流离的灾难。

明朝末年，先是农民大起义，战争绵延，嗣即因清兵入关，四出杀伐，湖南各州县迭遭蹂躏；随后又历三藩之乱，长沙一带“杀男妇数十万口”，“残废瓦砾，荆榛千里，如一青簰，白骨所在皆然。”^⑤醴陵县“自崇祯十六年至清顺治年间，人民备历刀兵、饥荒、病疫诸劫，死亡过半，业荒无主。新来占籍者，准其自由管领，插标为界。”^⑥慈利县境，竟至“百里无人烟。”^⑦沅江县“崇祯十七年流寇势若燎原，加以旱役荐臻，户口十损七、八。”^⑧桂东县于清初“合县遭荼毒者五载，至（顺治）十年剿平，仅存罗科、何世济、周台等六十三丁，茕茕孑遗，栖身荆棘。”^⑨武冈历经变乱，至清顺治十年“郡人十不存一。”^⑩

① 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第二表，《方志月刊》第6卷第9期。

② 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续）》，第六表之四，《方志月刊》第6卷，第10期。

③ 魏晉：《邵阳魏府君事略》，《宝庆府志》卷三五。

④ 《醴陵县志》《氏族志》，1948年刊。

⑤ 《善化县志》卷一九，叶五一〇，嘉庆一五年刊。

⑥ 《醴陵县志》《政治志·户籍》，1948年刊。

⑦ 《永定（大庸）乡土志》，《兵事》，光绪三十一年刊。

⑧ 《沅江县志》卷八《赋役·户口》，嘉庆庚午年重修。

⑨ 《桂东县志》卷四《赋役·户口》，同治丙寅刊。

⑩ 《重修武冈州志》卷二五，《残明兵事志》。

明清之间的“鼎革”究竟使湖南居民减少多少，是无法查核实数的。这里，只就巴陵（岳阳）、沅江、清泉（衡阳）、湘乡、酃县、耒阳、桂阳、桂东等八个县明末清初丁口赋额的差额作为参考，借以略窥人口减少的梗概。如下表：

	原额丁赋	清初编审后丁赋
巴陵①	13294丁	实存人丁 4467丁（康熙五十年）
沅江②	3600丁（明万历十年）	1002丁（顺治八年）
清泉③	11451丁（前明）	实存3303丁（康熙）
湘乡④	21033丁（明万历十年）	实存人丁6413丁（顺治十年）
酃县⑤	2541丁	实存人丁378丁（康熙十三年）
耒阳⑥	12068丁	实存人丁6020丁
桂阳⑦	7720丁（明季）	4382丁（顺治六年）
桂东⑧	2374丁	实存人丁653丁（康熙五十年）
合计	74101丁	26618丁

按上表核查，清初比明末减少47483丁，即减少64%。这当然不能认为就是湖南全省丁赋额减少的确切数据，也不能说这就是明末清初湖南人口减少的精确百分数。但大体可借以估计，明清两朝的“鼎革”，湖南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

清顺治、康熙以至乾隆年间屡颁“召民开垦”的谕旨，于是，大量移民进入湖南。大庸县“清顺治初因遭大乱，以致户无

① 《巴陵县志》卷一三，《政典志一·田赋上》，光绪一七年刊。

② 《沅江县志》卷八，《赋役·户口》，嘉庆庚午年重修。

③ 《清泉县志》卷九，《食货·入丁》，乾隆癸未年辑。

④ 《湘乡县志》卷三，《赋役》，同治一三年刊。

⑤ 《酃县志》卷八，《食货志下·丁赋》乾隆乙酉重修。

⑥ 《耒阳县志》卷二，《户口》光绪一一年刊。

⑦ 《桂阳县志》卷三，《赋役·户口》，嘉庆丁丑年刊。

⑧ 《桂东县志》卷四，《赋役·户口》，同治丙寅刊。

遗种。及康熙时，又遭吴三桂兵蹂躏。其时土著老民，百不存一。其后迁徙新户，十常得九，稽其户籍，以江西为最多，湖北、四川次之。”^①醴陵县因明末清初“重罹浩劫，土旷人稀，播迁来者十九为闽粤两省汀江、东江流域之人。”^②蓝山县清初从外迁入者达163族之众，以江西、广东两省为多，约各占三分之一。^③沅陵县“郡中故族鲜明以前者，建宗祠修谱牒，今尚多未逮木本水源。”^④邻近江西的浏阳县康熙年间所修县志载：“浏鲜土著，比间以内，十室有九皆江西之客民也。”^⑤检索《溆浦县志》《氏族志》，也可窥探移民的来向和大致年代。如下表：^⑥

全县汉族计154姓，475族（另瑶族14姓不在内）

移民来向及族数：

江西	38族
其他省	38族
本省	312族
合计	438族
不明	37族

迁入时代：

宋	29族
元	24族
明	115族
清	191族
不明	79族

① 《永定乡土志》，《户口》。

② 《醴陵县志》，《氏族志》，1948年刊。

③ 《蓝山县图志》，《户籍》，1933年刊。

④ 《沅陵县志》卷三七，《风俗志》。

⑤ 《浏阳县志》卷一四，《拾遗志》。

⑥ 《溆浦县志》卷一四，《氏族志·族姓》，1921年刊。

如果将不明情况的37族作为土著，则全县移民占到92%。前面提到，按宝庆府、靖州、湘阴等府、州、县志所载《氏族志》统计，该七州、县的人口中，移民占到98.4%。故到清代乾嘉之际，估计湖南全省移民占人口总数的九成以上，是大体可信的。

经过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度移民，湖南居民族源和血缘就基本上实现了更新，从而导致人口素质的提高。

在剥削阶级社会，人口的长期稳定，必然使剥削阶级人口的增长较劳动者增长更快，造成居民里不劳而获、玉食锦衣的剥削者（在封建社会，即包括皇帝为首的宗室、世家和文武勋戚、大小百官，以至地主豪强及其各色依附者）所占比例渐次上升，而胼手胝足、啼饥号寒的劳动者所占比例相应下降。比如，以明代朱氏王朝的宗室为例，朱元璋洪武年间为58人，而到明朝覆亡时，即繁衍至二十万人之谱^①。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骄奢淫逸，大多数不啻是社会的蠹虫，大量耗费社会财富，而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在中国古代，一般是经过农民起义的扫荡，使旧王朝倾覆，周期性地调剂人口中剥削者同被剥削者比例。湖南经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大移民，也是有这种调剂意义，成为导致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

其次，大凡离乡背井，迁往他方的移民，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拓意识，自立自强和勤奋创业的精神。相对来说，那些秉性庸懦，游惰懒散，无所作为的人，多数是不愿流离迁徙去追求温饱或较为富足的生活。所以，从生理素质、心理因素等方面来说，除了遭到某种限制和压迫者外，移民一般是强于土著的。

还应当提到，湖南古称“三苗之国”，从远古起即为多民族交错聚居之地，经汉族统治者的征讨和赶逐，少数民族遂多退处湘西、湘南崇山峻岭之间。人数多者为苗族，古称五溪蛮、武陵蛮，其余为瑶、侗、土家族。汉族同各少数民族长期相处，既多

^① 顾诚：《明代的宗室》，《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彼此争斗，也曾相互联姻。惟这方面资料确很不足。原因是少数民族历来受歧视，被目为蛮夷，故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一般都隐匿不宣。一本介绍城步苗族的书写道：“元末明初，城步苗族虽然大批调征出外，不少汉人从江西来这里屯田垦荒，但苗族同胞仍然占全县总人口的90%以上。清朝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在城步实施改土归流的政策之后，不少苗族同胞为了躲避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而填报汉族。到民国时，汉族人口便上升到全县人口的第一位。”^①这种变化，当然就包括汉苗（即填报汉族者）通婚所繁衍的后裔在内。湘西田姓甚多，有人作过考证，认为湘西田姓是春秋田齐之后，辗转迁徙到川、黔、湘边境，“其后裔亦都与土人、苗人杂居通婚，除一部分加入汉族、苗族外，大部分成为土家族。至今这一带的田氏，仍是土家、苗、汉族的大姓。此外，尚有元明时由江西迁入的田氏，也有一部分成为土家族。”^②在土家族人数较多的永顺县，“来自江西、辰州、沅州等地的汉族农民迁入永顺地区定居，……有些汉族商人，在十余年间，即‘累资巨万，置田户，缔姻亲’。”^③《溆浦县志》《氏族志》开列瑶族十四姓，提到“卜、奉、回、杨、蒲、刘、沈七姓，旧系溆瑶，其余则自辰迁溆浦，或以汉变瑶，或聚居十峒，或散处山间，昔极猖獗，今（按指1921年左右）则式微矣。”^④谭其骧考证：前述宝庆一府和靖州、湘阴等七州县中，有土著九族，其中扶、蓝、杨、姚四族，系蛮族后裔^⑤。看来，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州县，既存在以汉变瑶的情况，也不鲜以瑶（或苗，或土家）变汉的事例。故谭其骧称：“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

① 《城步苗族自治县概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② 何光若：《田氏的来源和分布》，《民族论坛》1987年第1期。

③ 《土家族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

④ 《溆浦县志》卷一四，《氏族志·族姓》，1921年刊。

⑤ 《湖南人由来考》，《方志月刊》第6卷第8期。